

在迷霧裡尋找燈塔——「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的民主發展

潘嘉偉

法國里昂大學跨文本與跨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近年，香港經歷了「雨傘運動」、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立法會與區議會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反送中運動和港版《國安法》等情況，民主發展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其後「雨傘運動」地區的基層民主發展「遍地開花」，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但在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強推所謂《國安法》之後，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狀況令人深感憂慮，言論自由更是日益消逝。香港今後的民主發展十分黯淡，有如在大海中風雨飄搖的孤舟，奮力尋找那遙遠的民主燈塔。

關鍵字

香港、民主發展、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國安法

壹、引言

香港民主運動發展始於中國大陸從英國接管香港後，二十三年來經歷了各種挑戰。自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現在，短短六年間，更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民主發展起伏跌宕，時而令人為更多年輕人的參與而鼓舞，時而為政府進一步的打壓而憂心忡忡。本文僅整體討論香港現在民主發展的狀況，並非深入探討引致各個影響民主發展事件的因由；故此，本文所述只屬本人粗略的觀察。

貳、「雨傘運動」喚醒民主運動新血

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的時候，誰也想不到會持續長達七十九天，突然令關心政治和香港民主發展的香港人非常鼓舞，那份喜悅令已屆中年的我們，紛紛感到香港還有救；但同時我們也很清楚，任何有人聚在一起的地方，都會有不同的意見，各人有不同的考慮，有些人為自己的政治本錢，有些人為理想和運動拼盡全力，有的人因為看不過眼政權太可惡但只會短暫參與。那前所未有的狀況和各階層香港人的積極參與，曾經讓我們認為，還是有足夠的社會力量爭取「雙普選」。

「雙普選」一直被北京以各種理由和方式壓著，或作為分化泛民主派的陷阱。不論民主派想怎樣退讓，希望和北京談判以換取一點點表面上的進展——像2010時通過所謂的「超級區議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席，讓大家錯覺有所謂增加民主成份——但與獨裁政權談判，根本沒法在互信的基礎上能得到甚麼實質的效果。香港泛民主派應該明白這一點，但在政治利益考慮下，務實主義的政治人物還是參與了與中方的「談判」。與不少香港人的看法一樣，我覺得那是非常錯誤的所謂「談判」；談判需要有利條件才能進行，才能討價還價，但明顯北京在香港畸形的政治制度下佔盡優勢，根本不用作出任何可信的承諾，也令之後多年沒法再於立法會選舉層面爭取「雙普選」。

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讓我們香港人意識到，一向關注的議題和爭取民主的方式需要作出變化，不再幻想在沒有任何有利條件下和北京談判有甚麼作用，而且政府透過所謂的「國民教育」在小學和中學已不斷進行各種洗腦的工作。洗腦從來都是中共的技倆，而且十分專長。當香港社會驚覺洗腦的各種方式已滲透學校各層面，家長和學生漸漸作出很強烈的回應，最終令政府收回相關明目張膽的政策。那時大家驚覺，政治現實迫使我們的學生思想加快成熟，當時還是中學生的黃之鋒和他的同伴令人刮目相看。

當「反國教」運動取得較為令人鼓舞的效果，戴耀廷教授、陳健民教授和朱耀明牧師牽頭提出「佔領中環」以爭取民主的想法。最初提出的時候，一向習慣只會參與短暫大遊行的香港人感到根本不可能發生；有些激進一點的政治人物雖，然經常諷刺「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和泛民主派自2003年「反對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大遊行後每年舉行的「七一大遊行」是「行禮如儀」，且多年來這樣的大遊行沒爭取到甚麼民主發展，但即使當時所謂的激進派，最激進的作法也只是在大遊行後呼籲民眾留守，部份參與短暫的堵路和衝擊警察防線；在那個時候，這些行為已被認為非常暴力，而警察最多也只是警告和拘捕極少數衝擊防線的人士。因此，當提出「佔中」的時候，很多人即時的反應是，參與者坐在香港金融地帶街上一整天後，要怎樣應對被警察抬走？甚至找來其他國家曾參與佔領行動、或曾在大型集會中被警察抬走的社運人士，分享被警察抬走時應該怎樣保護自己。那個時候還特別強調「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結果，在從來都不曾想過的情況下，香港人在 2014 年 9 月底看到了警察和政權的回應，並第一次嚐到了催淚彈，令更多香港人驚醒了。之前以為香港雖然被說是「示威之都」，但一直讚嘆遊行都很和平；警察當時使用的武力，相對其他國家的警察使用驅散集會時使用的武力算是挺溫和，但催淚彈的出現，令不少人驚覺香港變了。學生、白領和平常不參與遊行的人，看了催淚彈的畫面，都走出來了；各人用雨傘抵擋催淚彈，成了這場運動的標記，因此被廣泛命名為「雨傘運動」或「雨傘革命」。原來大家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佔領行動，結果突然就發生了。第一天的氣氛很緊張，很多人都擔心警察會否在第一天就大規模驅散人群和抓捕；但參與的人很多，群眾力量令這一場運動拉開，一直維持了七十九天，不單是香港政府總部外的金鐘，旺角也成了另一佔領區。那七十九天對不少關心香港民主前途的香港人來說，是多麼美麗的回憶：學生在佔領區繼續學習，各種不同的演講，很多人在上班前跑去佔領區支持在佔領區的人，下班後跑去佔領區一起參與。密密麻麻的帳篷和雨傘成了眾多傳媒報導的畫面。

為甚麼七十九天的佔領好像沒起到甚麼具體作用，北京和香港政府仍舊不給香港人兌現「雙普選」的承諾？這是很多學者和參與運動的人士都探討過的問題。筆者作為長期參與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和研究員，認為一般香港社運人士不太願意了解中共的手段，只把香港政府看成是要應付的對手。在很多的回應中，香港社運人士都是集中要求香港政府對話，要求香港

政府官員負責；這可能是因為本土意識的提升，令一般參與社運和政治運動的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十分抗拒直接要求中國政府回應，或是從沒有聽進當時的社運領袖強調要求中國政府直接對事件負責和回應。不是說直接要求中國政府直接回應，一定會帶來根本上的分別，但爭取對象一直都應該是中國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因為香港官員在所謂「一國兩制」的政治制度下，沒有人會願意在任時提出任何有違中國政府的看法和做法；不斷只對著沒有實權的香港官員提出要求，怎樣也不會有實質效果。

參、「後雨傘運動」的迷思

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結束後，誰都不會想到香港會變成今天這個局面。香港現在的墮落，大家不只是憂心，更是對香港前途的恐懼與失望，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失望，對香港法治的失望、甚至絕望，完全籠罩整個社會。原來從「雨傘運動」後高漲的情緒，在一連串事件後，香港社運的情況跌入前所未見的低谷。

在「雨傘運動」後，大部份香港人都發揮非常務實的精神；包括筆者，大家繼續為生活奔波，不論對民主和人權有多關心，參與了這樣一個大型社會運動後，仍然沒有改變這個政權，「雙普選」遙遙無期。比較樂觀的人會說，不少「傘後」組織成立，大家都往好的方向想著「雨傘運動」的種籽在香港各區各領域「遍地開花」，曾經一度一片樂觀積極的景像。

努力落區成為大家都深信能深根社區，¹ 改變社會文化的有效方法；更多年輕人投入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成立「傘後」組織和政黨。從學生組織到專業人士組織，以至地區組織，百花齊放，發表各種政治光譜，包括進一步推動本土意識和探討「香港獨立」的立場。強調「本土」和提倡「港獨」成為年輕人之間的主流。年輕一代對中年和上一代關注民主的人士越來越沒耐性，在社交媒體和出席活動討論民主發展和香港民主狀況，很多時候看到年輕一代較傾向激進一點的「本土」和「港獨」的立場。不同世代對「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文化認同，比以往有更深的鴻溝。

1 落區：落實地區、社區的意思。

泛民主派與年輕一代社運和政治人物之間的分歧，令中共和香港政府更能以各種方式分化關注民主發展的香港人。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的年輕候選人與傳統泛民主派之間立場與策略越見矛盾。最終本土派的年輕人成功進入議會，但在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時，便因宣誓方式而被取消資格，DQ（disqualified）變成有意從政的人要面對的挑戰。選舉主任過往只是按章辦事，但從此扮演取消候選人參與資格的角色。選舉戰場頓時改變，選舉主任可以決定候選人是否效忠基本法，至於何謂效忠基本法，對選舉主任的決定，當事人只能以司法覆核的方式爭取挑戰該決定，那已足夠令當事人浪費長時間爭取，無疑是有效打擊民主派人士參選的做法。

肆、「反送中」運動與基層民主發展

在DQ陰影籠罩下，2018年年中，受歡迎的年輕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暴動罪罪成定讞，被判入獄六年，香港民主發展面對空前的挑戰。正當大家剛回過神來，想重整旗鼓做深層社區民主發展的工作，香港政府於2019年初推出討論修改《逃犯條例》。中共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斷說因為中國和香港沒有移交疑犯的法律規定，不修改《逃犯條例》會令香港變成逃犯天堂。幾個月的討論，並沒有詳細安排的公眾諮詢，但在年中發生「潘曉穎被殺案」，疑兇陳同佳承認在台灣殺害女朋友，但礙於香港和台灣沒有移交疑犯的法律安排，案件成為香港政府欲強推「逃犯條例」的藉口。但香港人對條例有關香港人會被移交中國大陸的深切疑慮，特別對中國大陸欠缺司法獨立，尤其擔心會出現被刑訊逼供和無法會見律師的情況，根本沒法有公平審訊；市民也對「銅鑼灣書店」桂民海、林榮基和李波等人被綁架回中國大陸或在大陸被任意拘禁的事件記憶猶新，恐懼令香港人再次團結上街反對，「反送中」運動引起廣泛關注。

警察驅散人群的做法比「雨傘運動」時更為激烈，香港人除了再次嚐到催淚彈，警察各種打壓抗議人士的做法，越來越令人嘩然：毆打抗議人士、橡膠子彈、水炮車、荷槍實彈指向抗議人士、警察遮掩制服上的警號，其他各種之前從沒聽過用來驅散人群的武器都出現了。香港的街頭抗議行動，再次長期成為國際新聞，大學校園甚至變為警察搜捕以至與抗議人士對壘的場地。香港的社會運動，警察和抗議人士之間訴諸武力的做法，令全世界對香港完全改觀。

警察瘋狂抓捕一千多人，全城陷入恐懼之中，已不再單是爭取民主制度，過去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傳統和克制專業的警隊形象，頃刻形成香港人對香港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絕望。

「反送中」運動的後期，正值香港區議會選舉。香港政府和警隊傲慢和瘋狂打壓「反送中」運動的做法，也影響了香港的經濟，明顯引起了市民的反感。這一次的區議會選舉，令香港基層民主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境況。區議會傳統以來都被建制派所壟斷，一般市民只關注民生，而更多只是關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可獲得甚麼好處。因此，過往建制派被戲謔以「蛇齋餅」等各種小恩小惠收買基層選民的人心，區議會很長時間都是建制派議員佔多數；傳統泛民主派的落區工作雖能獲得一些議席，但對區議會整體影響有限。但在「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下，不少民主派的政治素人都在 2019 年的區議會當選，令區議會出現令人無法想像的「翻盤」的情況，區議會基本上由民主派人士控制了。慘烈的「反送中」運動令香港的基層民主發展產生了質的變化。

伍、《國安法》窒礙民主發展

大家興高采烈慶祝香港基層民主發展出現空前的樂觀景像；可惜好景不常，2019 年底和 2020 年初出現武漢肺炎（後來在中國政府為保國家形象下，把病毒命名為「新冠病毒」），又令形勢急劇轉變。病毒的出現沒有令中國和香港政府放緩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當香港持續努力對抗疫情，繼續起訴「反送中」運動被捕的人士的時候，香港政府於 2020 年 5 月公佈提請中國全國人大起草《國安法》。在完全把香港人排除在外、沒有任何具意義的公眾諮詢並繞過香港立法會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強行推動《國安法》，不單有違一貫的立法程序，條文的內容更令香港司法界嘩然。一向推行普通法的香港司法界，被政治八股和深具中共特色用語嚇得目瞪口呆，香港的法治制度受到空前的挑戰。何謂「國家安全」的定義，根據中國大陸法律的定義，含糊又廣闊，所有批評政府和中共的言論與行為，甚至與外國組織和人士的交流，都可以被看作涉及「國家安全」。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與結社自由，幾近蕩然無存。

《國安法》公佈當天，多個倡議組織宣佈解散，包括：學生領袖黃之鋒、

周庭和羅冠聰創辦的「香港眾志」、主張香港獨立的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和「香港民族陣線」等。被強推幾個月以來，已有多名著關注民主運動人士被捕，包括：壹傳媒和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學生領袖周庭等，以違反《國安法》的罪名被拘捕，但警方沒有清楚說明以甚麼原因用《國安法》的名義拘捕他們。

8月23日，12名香港人在逃亡台灣的途中被中國警方拘捕，送到深圳鹽田拘禁，不讓家屬會見，直到9月30日公佈才以涉嫌「非法跨越邊境」正式逮捕12名港人。「反送中」運動中，香港人恐懼的情況發生了，香港人真切感受到所謂「國家安全」和「被送中」的威脅。法治與自由已無法得到保障，民主運動陷入一片迷霧之中。

陸、結語

經歷近年的重大社會事件後，已無法容易評估香港政局今後的去向。本人對香港民主發展深感憂慮，香港的現況有如一條在風高浪急中的船隻，船員努力嘗試找尋燈塔，以求找到安穩的陸地，但大風大浪的情況恐怕還會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國安法》這把達摩克利斯的利劍懸在每位香港人的頭上。民主發展顯得更遙遠，「雙普選」遙遙無期，能否維持法治與日益喪生的自由，變成香港人更迫切需要處理的課題。

Looking for the Lighthouse in the Dense Fog——The Democratic Struggle in Hong Kong since the Umbrella Movement

潘嘉偉

Patrick Kar-wai Poon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for Transtextu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IETT),
Université de Lyon, Fra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and candidates running for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District Council,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and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has encountered its most challenging time ever. Although grassroo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has blossomed in all district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although pro-democracy candidates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i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have become a matter of extreme concern.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s been quickly eroded after the Chinese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s forcibly enacted and enforc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future for Hong Kong'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s very dim. Hong Kong is like a lonely boat struggling in a wild sea looking for a distant lighthouse.

Keywords

Hong Kong,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mbrella Movement,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National Security Law
